

MAO ZEDONG DE FEICHANG ZHILU

非常之路

毛泽东的

蒋伯英 / 著



人民出版社

MAO ZEDONG DE FEICHANG ZHILU

毛泽东的

非常之路

蒋伯英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连仲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的非常之路/蒋伯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

ISBN 7-01-003402-8

I. 毛…

II. 蒋…

III. 毛泽东-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305 号

毛泽东的非常之路

MAO ZEDONG DE FEICHANG ZHI LU

蒋 伯 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14 千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3402-8/A·264 定价:18.00 元

顾 问：刘华清 李德生 黄 华

主 编：李力安

副主编：程中原 曹志为

1981.12.10

困境中的偉人

薄一波



目 录

第一章 压抑与探索	(1)
一 同陈独秀发生分歧	(1)
二 积极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6)
三 到实践中寻求答案	(10)
四 在反革命政变的逆流中	(14)
第二章 在历史转折关头	(20)
一 率先提出“上山”思想	(20)
二 从提出“湘南特别运动”到出席“八七”会议	(23)
三 关于秋收起义纲领的论争	(26)
四 秋收暴动受挫	(33)
五 受到中共中央处分	(39)
第三章 井冈山岁月	(44)
一 艰辛的开拓	(44)
二 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	(53)
三 土地革命的初次尝试	(63)
四 来自“左”倾盲动主义的压抑	(70)
五 毛泽东再受压制	(81)
六 被迫撤离井冈山	(89)
第四章 艰辛的开拓	(97)
一 艰难悲怆的征程	(97)
二 描绘新的蓝图	(102)

三	抵制中央“二月来信”·····	(108)
四	开创赣南、闽西新局面·····	(114)
五	红军党内论争与毛泽东遭受排斥·····	(119)
六	从隐居山村到重返红军·····	(132)
第五章	同李立三“左”倾错误抗衡·····	(144)
一	排除林彪干扰与进兵赣西南·····	(144)
二	同“城市中心论”发生冲突·····	(154)
三	找到了回击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	(160)
四	折中与抗衡·····	(166)
五	终止冒险主义的行动·····	(178)
第六章	击破军事“围剿”·····	(186)
一	“诱敌深入”与各个击破·····	(186)
二	“钻牛角”战术与横扫千军·····	(195)
三	横扫千里破强敌·····	(205)
第七章	瑞金浮沉·····	(216)
一	王明上台与毛泽东去职·····	(216)
二	独辟蹊径下漳州·····	(222)
三	毛泽东再遭批判·····	(233)
四	落入政治生涯的低谷·····	(242)
第八章	走出困境·····	(253)
一	在查田运动中的一场较量·····	(253)
二	“他几乎完全引退了”·····	(265)
三	中央纵队的“三人团”·····	(277)
四	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284)

第一章

压抑与探索

一 同陈独秀发生分歧

1936年7月,43岁的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一个窑洞里,向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述说自己的历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个外国记者,也是第一次坦陈自己坎坷艰辛的个人经历。他在谈到1927年4~5月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显得有些冲动。他说,那时候中共仍然在党总书记陈独秀的操纵之下,“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①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概括了他在大革命中后期,即1925年至1927年间他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的深刻分歧。

在大革命的中后期,毛泽东担任的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并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组织部长的职务主持着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6页。

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一方面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基于对农民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深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艰苦探索中得出结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是农民革命。

然而在那个年代,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不屑一顾。陈独秀所重视的不是农民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获得胜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待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充分发展之后的遥远的将来,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认为将来如何,也没有预计的必要。正是在这样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大权在握的陈独秀在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毛泽东关于重视农民问题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不仅是陈独秀,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城市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不仅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湖南发动许多次工人斗争,并且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才比较一致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在大规模革命兴起的时候,总能以强劲的势头带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发起进攻。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往往在其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者遭到强大的反动势力压迫时,很快发生变化,有的向反动势力妥协,其中一部分甚至转入到反动阵营中去,成为打击工人阶级的帮凶。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热切要求,但无论从其自身力量或是革命的坚定性方面,都显得十分脆弱。同盟者相继离去,使得工人阶级立刻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至走向

失败。

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而且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迫,潜藏着巨大反抗精神的农民结成同盟军,非如此便不可能使得国民革命运动成为一股坚强持久的革命势力以击败强大的敌人。从此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作实际的调查研究,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叙述他如何开始重视农民问题: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①

1925年2~8月,毛泽东在家乡韶山一带第一次直接地调查了农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从而发现了农民中间蕴藏着巨大的战斗精神。于是他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雪耻会、农民协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分别发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核心。

可以认为,毛泽东这次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是他由注重于城市斗争向注重于农民运动的一个转折。

到达广州以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刊》,还兼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以大部分精力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4页。

投注于农民运动的理论研究,并且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即将兴起的农民运动高潮培养了大批骨干。

经历了中共建党最初几年对工人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实践,转而投身研究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为代表。

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目的在于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不懂得到哪里去寻找力量,建立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陈独秀显然感觉到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矛头所向,他根本拒绝毛泽东的观点。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加上他一贯的家长式的专制作风,陈独秀所采取的方式之一就是阻止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发表。毛泽东在向斯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不能否认,陈独秀也曾经承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早在大革命前期他就对此作过研究,比毛泽东还要更早一点。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认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足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

力,所以在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陈独秀对农民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在他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也作出了若干关于重视农民运动、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等方面的决议。他自己还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80期撰文指出:“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

然而由于陈独秀习惯于在书斋中研究革命理论而不愿意去做接触实际的探索,当急风暴雨式的农民革命浪潮骤然兴起时,他就惶恐不安,以蔑视的姿态站在对立面指手画脚。

归根结底,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也即反对在大革命风暴中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这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一种反映。他轻视农民,认为农民虽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势力涣散、思想保守、流动性大而难以加入革命;他还轻视中国无产阶级,认为中国产业不发达而工人阶级幼稚,难以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此,陈独秀过分倚重于资产阶级,宁可舍弃工人农民也不敢触动资产阶级的权益,以换取与资产阶级暂时的而且越来越脆弱的联盟。

陈独秀的理论与行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不久,特别是在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以后,越来越引起中共党内许多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同陈独秀之间由农民问题理论方面产生的抵牾,进而发展为在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无产阶级是否应当坚持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农民究竟是否应当被视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等等一系列最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已经成为指导大革命成败关键的实际问

题,不可能再有犹豫或调和的余地。

毛泽东后来对这一阶段同陈独秀之间发生的分歧作了这样的概括:“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顶点。”导致毛泽东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发展到顶点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由农民运动发展而必然产生的土地革命问题的论争。

二 积极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农民运动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在南方各省的广大农村中迅速兴起。在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农民们已经不满足于减租减息,他们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并在一些乡村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成为了驱逐军阀势力的开路先锋和忠实可靠的支持者。

有了革命政府和北伐军的支持,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农会。至1926年底,湖南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100多万人,1927年3月达到200多万人,而且正以更快更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把革命进程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农民斗争的矛头所向,已经不是几个月前与北伐军合作打击的北洋军阀,而是转向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集团赖以生存的顽固基础——地主阶级。这场斗争在短短4个月中造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对这场斗争实地考察之后作了如下生动的叙述: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

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①

毛泽东这段精彩的文字触及到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一个极为紧要的问题，这就是摧毁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推翻地主阶级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以及种种封建宗法制度，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政权。

自然，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激现象，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致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们在乡村中由大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页。

继广东之后，湖南农民运动以其独特的方式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这不仅引起了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一些人的不满，而且更遭到资产阶级的怨愤与攻击，在武汉和长沙城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随处可以听到咒骂农民运动的言论。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下了当时他在长沙的见闻：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很明显，随着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推进并逼近北方军阀大军云集的中原地区，国民革命的胜利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不仅握有军事大权的蒋介石日益暴露出背叛的面目，开始向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全面夺权；而且在武汉、长沙的那些自诩为“左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开始动摇，对于由革命深入而必然引起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和自卫武装，表现出严重的恐惧和对立。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向会议报告了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趋势和区委的意见，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赞同湖南区委的意见。

可是陈独秀听不进他们的意见。他在政治报告中声称当前党

外的危险倾向是政治军事当局由民众运动迅速发展而引起的右倾,党内的危险倾向则是“左”倾,如果不克服这些党内的“左”倾,那么与党外右的倾向之间的距离将越来越大,成为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要因素。由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克服民众运动中的“左”倾,以此缩短同右倾之间的距离以维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陈独秀看来,党内民众运动中的“左”倾,主要反映在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方面;激进的农民运动及由此而提出来的土地问题,超越了农民目前的要求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减租减息的限度,是“左”倾危险的一种反映。他甚至无视农民中间极大的革命性以及已经被农民提出来的土地分配问题这一现实,认为农民所关心的仅仅是减租减息等初步的经济要求,“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

显然,陈独秀不是不懂得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只是企图用贬低农民的革命性来为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并借以压制党内主张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意见。

汉口特别会议接受了陈独秀政治报告的观点,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要求全党大力纠正所谓的“左倾”,抛弃“耕地农有”的幻想。另外,会议否认以是否赞成土地革命作为区分是不是左派的标志。这就是说,不赞成实行土地革命者未必就是右派。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无异于给那些标榜实行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主义,但在实际中又维护封建主义反对土地革命的所谓“左派”提供了一个防护面具。

尽管毛泽东不赞同陈独秀的观点,但是会议并没有对毛泽东的意见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会议使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发展得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特别是由于这次会议忽视创立革命武装,否定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等等重要原则,从而成为陈独秀右

倾投降主义形成,并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标志。

三 到实践中寻求答案

汉口特别会议一结束,毛泽东随即出发前往湖南。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主要在于用实际的调查材料来回答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农民运动及其土地革命的错误主张。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对于他赴湖南调查的心境有这么一段话:“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毛泽东这次不同寻常的农村调查,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至2月5日结束,先后到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调查对象涉及党员、干部、农民、工人、士绅、妇女、商人,乃至钱粮师爷和衙役、狱吏。调查项目大如国民革命的意义与方针政策,小至一家一户斗米寸金的收支账目。在当时交通通讯十分落后,大多要徒步行走的年代,毛泽东要完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其韧性毅力和跋涉艰难的状况可以想见。

作为农家子弟的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且又专注于农民问题研究,对于农村与农民的状况不可谓不熟悉。然而当他以一个全国农民运动指导者的身份,带着寻求解决党内论争的一系列疑问,再次回到离别一年的乡村,以更新的视角观察一切的时候,他就像忽然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些新鲜事物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他被波涛汹涌的农民革命壮举所叹服,为农村中贫苦农民的